

苏联和未来

(供内部参考)



苏 联 和 未 来

对苏联共产党新綱領的分析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本书系根据美国普萊格出版社(Frederick A. Praeger) 1963年同时于紐約和倫敦出版的《苏联和未来》(The USSR and the Future)一书譯出的。主編者为倫納德·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原书附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綱領及1919年綱領全文，中譯本略去未譯。本书譯者姓名附于每篇文章之后。

(供内部参考)

苏联 和 未 来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装

統一书号：11017·215

1963年12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4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218千字

印张 9 8/16

印数 3,001—4,000册

定价(10) 1.40元

目 录

作者介紹.....	(3)
引言	伦納德·夏皮罗 (6)

一 历史与意識形态

通过新党綱的前前后后	沃尔夫甘·伦哈德 (17)
綱領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傳統.....	乔治·利希特海姆 (40)
苏联社会政策的理論与实践	埃里克·貝特彻 (58)

二 国际事务

共处和革命	維克多·弗兰克 (80)
民族主义和民族	理查德·派普斯 (94)
哪一种危险更大一些: 修正主义 还是教条主义?	乔治·登尼凱 (113)

三 經濟方面

“1980 年”的經濟	艾尔弗雷德·佐伯曼 (130)
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和工資.....	彼得·魏尔茲 (145)
苏联农业和苏共綱領	西蒙·卡比什 (163)

四 政治方面

綱領中的党和国家	伊沃·拉本納 (185)
苏联的国家是否在消亡?	所罗門·姆·施瓦茲 (200)
苏共的新党章	伦納德·夏皮罗 (217)

五 其他問題

苏联的創作自由問題	薇拉·亚历山德羅娃 (236)
-----------------	-------------------

教育和綱領	斯·弗·烏捷欽 (253)
苏联武装部队和綱領	尼古拉·加萊 (264)
苏共綱領是世界共产主义	
运动的指南針嗎?	克里斯蒂安·杜沃尔 (275)

作者介紹

伦納德·夏皮罗: 伦敦大学俄国政府与政治学科讲师。著有《共产党独裁政治的起源》(1955年)和《苏联共产党》(1960年)两书。

沃尔夫甘·伦哈德: 1921年4月生于維也納, 1935年至1945年住在苏联, 当时曾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学校受过政治上的思想灌輸。1945年以烏布利希集团成員身分回到德国, 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1949年3月逃到南斯拉夫; 1950年以来一直在西方积极从事著作和发表演說。用英文写的书包括《革命的产儿》(1957年)、《斯大林去世后的克里姆林》(1962年)和《今日的苏联意識形态》(即将出版)。

乔治·利希特海姆: 經常就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的問題为英美杂志撰写文章。住在伦敦; 前《苏联研究》的編者之一。著有《馬克思主义——一种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1961年)。

埃里克·貝特彻: 斯图加特大学經濟学教授, 斯图加特—霍恩海姆农业大学經濟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所长。著有《十字路口的苏維埃政治經濟》(1959年); 編有《社会政治与社会改革》(1957年)。

維克多·弗兰克: 作家和广播評論員。生于俄国; 毕业于柏林大学俄国历史系(1934年); 1950年至1953年曾任英国广播公司对欧广播部俄語节目負責人; 1953年后任慕尼黑和紐約的自由电台顧問, 现任自由电台伦敦办事处主任。

理查德·派普斯: 哈佛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和俄国問題研究所副所

长。著有《苏联的形成》(1954年)和《卡拉姆辛的古代俄国和现代俄国回忆录》(1959年)。任《俄国知识界》的主编(1961年)。

乔治·登尼凯：1920年至1922年任莫斯科大学历史与历史社会学教授。1922年后在法国、德国和美国从事研究和文学活动。1887年生于俄国。现在住在纽约和华盛顿。

艾尔弗雷德·佐伯曼：在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工作，专门研究集中计划与管理经济问题，在这方面著述甚多。

彼得·魏尔兹：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与新学院评议协会会员。布兰代斯大学经济学教授。著有《价格、成本与产品》(1962年)、《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牛津，1962年)和许多关于共产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文章。

西蒙·卡比什：经济学家，慕尼黑苏联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895年生于白俄罗斯。

伊沃·拉本纳：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苏联与东欧法律科纳菲尔德研究员；前萨格勒布大学国际法教授；著有《苏联关于国际公法的观念》(巴黎，1954年)和许多文章。

所罗门·姆·施瓦茨：1883年生于俄国，毕业于俄国(得法学学位)和德国(得法学博士学位)；纽约俄文刊物《社会主义信使》的撰稿者和主编。著有《列宁与工会运动》(1933年)、《苏联的犹太人》(1951年)、《苏联的劳动》(1952年)和其他著作。

薇拉·亚历山德罗娃(所罗门·姆·施瓦茨夫人)：1895年生于俄国；曾在莫斯科大学研究斯拉夫语言学 and 文学；住在纽约。著有《被禁止的故事》(1955年，是俄文的)，即将出版的著作有《苏联文学史(1917年至1961年)》(纽约德伯尔代出版公司)。

斯·弗·烏捷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研究員。曾在莫斯科大学、基尔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著有《簡明俄国百科全书》（1961年）。

尼古拉·加萊：軍事历史学家、作家和編輯。生于俄国，毕业于1917年革命后在国外設立的俄国参謀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曾在法国外籍軍团中担任軍官。现任慕尼黑苏联問題研究所刊物《通报》的主編。

克里斯蒂安·杜沃尔：慕尼黑自由电台中央研究部关于中苏关系和共产党集团內部事务的高級研究員。曾在柏林自由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学习。

引 言

从烏托邦到现实主义

事实在最后也許会証明，本論文集所論述的苏共新綱領并不是綱領的制訂人所說的那樣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像在它之前的 1919 年的綱領一样，它将来也許会給批評者抓住許多把柄，以致被束諸高閣。还有下面一个情况也可以給人許多把柄：1961 年 10 月的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本来主要是为了辯論和通过这个綱領而召开的，可是，在大会上，对斯大林和他在苏联国内外的所謂支持者的有声有色的指責居然喧宾夺主，变成了宣传的重点。不过，話虽如此，如果人們怀疑这个綱領的重要意义，那就錯了。不管这个綱領在苏联国内政治生活中可能会遭到怎样的命运，它目前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代表着苏联領袖們經過深思熟慮以后希望在国内外呈现的形象。或許要过一些时候以后，我們才会看到另一个如此苦心經營的文件。

因此，为本书写論文的学者們对这个綱領进行一番研究是完全值得的。这么多比我有研究的人已經从一切重要的角度研究了這個綱領，我在这里可以不必再向讀者贅述綱領的任何具体方面了。但是在这里也不妨看看这个綱領的比較一般的性质和特点，并且在綱領中探索一番，看看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綫索可以說明在苏联进入六十年代并且瞻望国内外未来形势的时候它自己国内的政治气氛如何。在表面上，这个綱領所展望的当然是共产主义的前景，而且綱領还向苏联公民发出最后的响亮的号召：“党庄严地宣告：这一代的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这个号召也

正是要苏联公民去从事建設共产主义的任务。綱領的比較含糊的部分在談到共产主义的幸福时还頗帶有抒情味道呢。远在馬克思——照列宁的解释——把共产主义的烏托邦引入党派政治的領域以前，共产主义的烏托邦就吸引过許多政治思想家們。我們从馬克思的 1944 年的手稿中也可以看到，远在馬克思进行更有名的社会和經濟分析以前，他就幻想过未来的景象，那时人們不再“同社会疏远，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缺点都将被克服”。^① 列宁通常不是非常喜欢幻想的，因此对列宁來說，共产主义就变成了一个比較实际的东西。著名的“苏維埃加电气化”的公式也許只不过是一个口号，無論如何是沒有多大意义的。在 1917 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有明确的、实际的、具体的描繪：“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时，也就是說，在人們已經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他們的劳动生产率已經大大提高，因此他們能够自願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領取的商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領取。”不管对遙远的未来还有怎样模糊的希望，从綱領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綱領所具体談到的二十年后应当出现的那种共产主义和这里所說的并不是一回事。

首先，綱領清楚地表明，国家將繼續掌管“按需”分配的工作——决定每个人的需要的將是国家，而不是每个人自己。其次，国家本身在整个可以預見的时期將存在下去，虽然它在遙远的、完全不肯定的将来注定要“消亡”。更加具体地說，党不仅要繼續存在下去，而且还要在引导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起特別重要

① 关于这个問題，請參閱罗伯特·塔克尔近著《卡尔·馬克思的哲学与神話》一书，劍橋大学出版社，紐約，1961 年。

的作用。我們一点也沒有听說党要“消亡”——哪怕是在遙远的、不肯定的将来也好。

事实上，如果把綱領中的比較漂亮的詞藻剝去，那末就可以看出，綱領所許諾的并不是实现传统意义的共产主义，而是扩大物质繁荣，为最后实现遙远的共产主义作准备。的确，如許多評論家所指出的，綱領中所設想的是某种和繁荣的福利国家頗为相像的东西——也許可以說是一个强迫措施和管制措施比瑞典多一点的國家。哪里有國家，特別是哪里有一个有势力的、无处不在的党，哪里就会有“治人”的局面，就不可能有恩格斯（以及圣西門）所說的那种“管理事情”的局面，也就是不可能有幸福的人們自己进行輕松愉快的、自发的自我管理的局面，他們永不再为妒忌、恐惧和紧张等資本主义的罪恶所苦。只要党繼續进行控制（綱領里完全沒有提到党要在二十年以內消亡或者以后任何时候消亡），侈談——比方說——列宁在《國家与革命》的烏托邦式的幻想中所設想的輕而易举的管理就是毫无意义的。照列宁原来的設想，这种东西甚至在剝削者还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就可以出现——大家都要学习管理，并不需要任何特別的鎮压机构来处理少数仍然可能发生的违反良好规范的现象。照列宁看来，随着剝削者被消灭，随着大家都养成作为兄弟而不是作为階級敌人在社会中生活的习惯，这种初期的烏托邦的理想将会逐步实现。列宁相信在革命以后它就会誕生。說起来也很奇怪，这种烏托邦至少和二十年代在英国非常盛行的“高等”学校是很相像的。《國家与革命》中几乎沒有提到党。然而正如布哈林在 1918 年清楚地指出的：“列宁同志曾經写道，在俄国，每一个普通人都将被教会治理國家。教会普通人治理國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在普通人上面設一个政治委員，那会有什么結果呢？”当时这是問題的症結所在，现在这仍然是問題的症結

所在。新綱領至少已經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點，因為它承認黨的控制將繼續存在，並且顯然將長久存在下去。

如果人們回過頭來看看 1919 年的綱領，那末綱領承認黨的控制將繼續存在下去的意義就變得特別具體了；附帶說一句，這個綱領在獲得通過以後沒有多少年就被置諸高閣了。人們如果讀一下這個綱領，就會進入《國家與革命》的世界，進入幻想、理想主義和烏托邦的世界。在這裡，可以達到完善境界的人被描繪為正在昂首闊步地向前邁進，一旦資本主義和剝削所產生的邪惡被逐步消除，他們就會得到報酬，恢復自己的天然德性。只有“剝削者”將被剝奪自由。對自由的一切限制必須“毫無例外地”看做是“過渡性的措施”，其目的是要“打擊剝削者”為了維護自己以不正當手段得來的特權而進行的活動。在剝削消失以後，黨將保證“完全消除”對自由的一切限制。（人們滿可以問一下，現在誰是剝削者呢？）黨將“完全消滅”以前的不平等現象和特權的一切痕跡，並將規定一切官員在執行職務時都有充分的職權。刑法“最後”將為一系列“教育性質的措施”所代替。工會必須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全部管理權實際集中在它們手裡”。大概正是由於完全相信沒有人會花費力氣去讀 1919 年的綱領，1961 年的綱領才溫和地說：“黨的第二个綱領已經……實現了。”

重实际的列宁当然也有他的理想主义的和烏托邦的方面。但是 1919 年的綱領并不是当作一种烏托邦制訂的。它是当作一种实际行动計劃擬訂的，它被认为是一个只要热心地从事就能實現的綱領。它并不是自上而下强加在有着严格紀律的全体黨員身上的。它是以一种到 1961 年的時候已變得不可想像的自由而真誠的方式加以討論和辯論的。在制訂這個綱領的時候是打算要加以執行的，至少從辯論的情況看來似乎是如此。列宁真的相信普通

人有一天会进行“治理”，而沒有政治委員站在他們身边嗎？這個問題他也許从來沒有允許自己去細想，哪怕是在他自己的心灵深处也好。

無論如何，1961年的綱領已經拋棄了這些烏托邦的幻想，我不能肯定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這個綱領明確地宣布一個具體的事實：黨的統治要繼續存在下去。它要求蘇聯公民認識並接受這個事實，不要幻想在這方面，事情會發生變化。作為交換條件，這個綱領保證給他們巨大的物質利益和繁榮。

這是部分地認識到一個真理。這個真理就是：蘇聯社會在本質上是一個專制政體，不管多么仁慈，它終歸是專制政體，而且還是靠了黨的機構來進行統治。綱領能夠部分地認識這一真理，也許還是前進了一步。正視事實總比生活在一個幻想的世界中來得好。列寧和斯大林都曾積極鼓勵保持一些神話的世界，在這些神話的世界中，虛構的東西是用簡單的高壓辦法加以維持的。政治委員們進行治理，而卑賤的普通人則被告知“他們的”政府制度是迄今最自由和民主的政府制度。如果卑賤的普通人提出異議，他們就要被關進獄中，或者被當作階級敵人槍斃。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連同它的人權憲章在贊美斯大林的歌聲中獲得通過的時候，也正是裝運大清洗的第一批犧牲品的死刑犯囚車從人家門口隆隆走過的時候。蘇聯政府不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黨的專橫的高壓手段基礎上的。對這一點的認識可能就是設法把高壓手段保持在某種適當範圍之內的第一步。

這的確也就是赫魯曉夫聲稱正在做的事情。綱領中有很長的一節斥責“個人迷信”並且規定了黨將來的行動規則。這一切都照樣寫在也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的新黨章中，這種改變的實際價值在本書中的其他地方也將談到。這種改變看來不是

很根本的，也不是很广泛的。的确，在个人还没有机会在不受政府和党影响的法庭中要求政府或党赔偿损失以前，苏联是否能实行任何基本的改变，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局面可能仍然是遥远的事情。但是事实仍然是：现在的制度公开承认存在党的独裁，而过去的制度却精心编造了一套习见的谎言，硬说党的统治不存在，或者只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两相比较，在现在的制度下，这种局面实现的可能性还要大一些。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把这样多的时间和注意力花在重新指责斯大林和重新指责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的恶行上，这不是一种巧合。赫鲁晓夫煞有介事地假装他并没有和斯大林的虐政和暴政完全联在一起，这是没有用的（如果他真的装做这样的话），因为如果他真是没有同斯大林的虐政和暴政完全联在一起，他根本就不能活到今天来谈事情的原委了。因此如果他要人们响应他的呼吁，同意接受党的控制，换取纲领答应在不久的将来给予他们物质利益，他就必须经常地一再证明他已经真正同过去一刀两断。因此，在作了 1956 年的秘密报告以后，还不得不作 1961 年的公开报告，还不得不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陵墓。这个过程将在什么地方停止呢？

这个问题所以发生是因为简单的事实仍然是：对暴君来说，斯大林所实行的那种简单的恐怖手段同他的继承者开始的改革努力比起来，是一种安全得多的暴政。德陶凯维尔作了这样的解释：

“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不总是由于这个国家的情况日益恶化的结果。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人们最初不声不响地支持最暴虐的统治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统治似的，在这种统治的压力减少的时候，反而会立即用暴力推翻这种统治。在革命中被推翻的政府制度几乎总是比在它前面的政府制度有所改进。经验证明，对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

時刻通常是在它開始改進的時候到來的。一個毅然擔負起安撫自己的長久遭受壓迫的子民的君王，要想保全自己的地位，非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不可。人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惡，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一旦他們覺得有可能擺脫這些邪惡，這些邪惡就會顯得是不可容忍的了。”^①

無怪乎赫魯曉夫的政策使中國共產黨人和蘇聯黨中像莫洛托夫那樣的死硬派感到不安，這些人認為，斯大林實行的統治方法仍然有許多可取之處，如果要黨的全部權威不受到危害的話。

在我看來，這就是新綱領的實質，如果人們看看這個綱領的實際的方面，少去注意這個綱領里面帶有烏托邦味道的章節的話。在這些章節里，綱領談到了不肯定的、不可預言的未來，喚起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物質願望並且含糊地許諾黨的暴政將保持在一定的範圍以內。這同1919年的革命的烏托邦是大不相同的。這所以不能不在嚴峻而狂熱的中國共產黨人中間引起強烈的憎惡，是很容易理解的。在1920年，就在第二個綱領通過以後一年，列寧本人就不得不在他所著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指責過份的革命熱情——主要是在蘇俄以外的過份的革命熱情。我猜想過着半退休的生活的毛澤東此刻正在忙着寫名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右派老年病》的續篇。從他的觀點看，這正是蘇聯黨患的病。他的看法也許並不很錯。

蘇聯已經達到它的政治發展中的一個有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赫魯曉夫的政策引起的問題正在變得尖銳起來。在斯大林活着的時候以及在這以後一些時候，這個制度是嚴厲的，然而也是簡單的。在官方看來，黨的統治是十全十美的，決不會錯的，正義的，歷史上預定的。不讓批評者講話，或者尋找適當的替罪羊，或者兩

^① 引自阿·德陶凱維爾所著《舊政權與革命》，第三部分第4章（這段話是我譯的）。

种办法同时采用，就足以应付人们对缺点的批评。赫鲁晓夫现在已经承认——不管他怎样大谈“个人迷信”和少数邪恶顾问的邪恶影响来掩饰这一点——党的统治是可能犯严重的错误的，而且的确犯了严重的错误。为了换取普通人在将来的支持，他不得不提出改革的诺言并保证同过去一刀两断。现在还看不出这是否会成为维持现有统治的可靠基础，在现有统治下，政府对被统治者自由表示真诚意志和决心的权利，还是坚决不肯支持。如果基础开始腐蚀，那就可能意味着要大大修改我们到目前为止所了解的一党统治。如果将来试图恢复绝对的恐怖手段，来支持正在腐蚀的基础（因为在这样一个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广泛地应用死刑的国家里，毕竟还保留着一定数量的恐怖手段），会不会出现另一个勇气十足、毫不动摇的斯大林呢？他会不会成功呢？

这些就是在今后二十年——或者今后二十个月——似乎会在苏联出现的问题。它们同共产主义没有甚么关系，同纲领中包含的其他许多高尚的思想也没有甚么关系。它们的重要性大概会远远超过纲领，就好像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斯大林的恶行的讨论在重要性上远远超过关于纲领的讨论一样。这个纲领不久也许会步前一个纲领的后尘，而被人束诸高阁。有些评论家感到很惊奇，不明白现在的苏联领袖们为什么竟然会作出具体的诺言，答应在一个可以预见的二十年的时期要完成什么任务。比方说，他们觉得，如果二十年后这些诺言仍然不能实现，那末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种对苏联社会的看法看来是不现实的。第一，按照普通的自然规律，这位领袖很少可能再活二十年，因而他的继承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指责他作出蛊惑人心的诺言。此外，纲领本身就包含一些留下后路的条款。纲领中包含这样一个警告：“国际局势的复杂化和由此而引起的国防费用的必要增加，可能延迟提高人民

福利计划的实现。”因此如果枪炮的地位仍然继续超过牛油的话，这总是可以把责任推到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帝国主义战争贩子身上。最重要的是，只要目前的一党统治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应当不难压制任何根据纲领提出的令人为难的争论或批评。相反地，如果党觉得难于压制这种令人为难的批评，这大概将会表明，它享有权力而不负真正责任的日子无论如何是屈指可数的。

总之，事实也许会证明这个纲领在国内方面不是很重要的——它象征着目前苏联的统治者的新面貌这一点要除外。但是它的确包含一些不大可能实现的尴尬的诺言（尤其是关于农业立即取得进展的诺言），因而也许很快就不能不把它同党的大部分实际的历史一道抛在一边。但是我觉得他们所以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刻制订新纲领，主要不是为了适应国内的需要。由于四十五年来提出的各种诺言很少兑现，因而要用任何关于未来的大胆的新诺言来吸引很多俄国人——哪怕是年轻的俄国人——大概为时已晚。但是在苏联以外的地方，却可以指望这个文件对广大读者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这些人是亚洲和非洲的新国家、不发达的国家的居民。正是对他们，俄国共产党人过去许多年以来一直发表特别的呼吁，坚信“帝国主义”国家的命运最后将由这些前帝国臣民来决定。

为了吸引亚洲和非洲的人民，在纲领公布以前，苏联共产党迫切需要一个基本的文件，来说明党的整个信念和党希望人们相信的关于党的历史的说法。斯大林的著名的《简明教程》曾经很好地适应这个目的，但是这本书现在被贬斥和抛弃了。新的党史虽然是在1959年才出版的，但是由于不合新的历史潮流，也变得过时了。无论如何，这本书太厚、太沉闷、太像《简明教程》，因而不适合出口的需要（事实上也并没有作什么努力来传播这本书）。对比之